

炎帝文化研究

◇主编

王俊义

第三辑

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三题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研究

三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中华文明探源

夏禹文化四议

思潮与学派

明季三毁书院及其影响

五四时期章门弟子的中西文化观

文物与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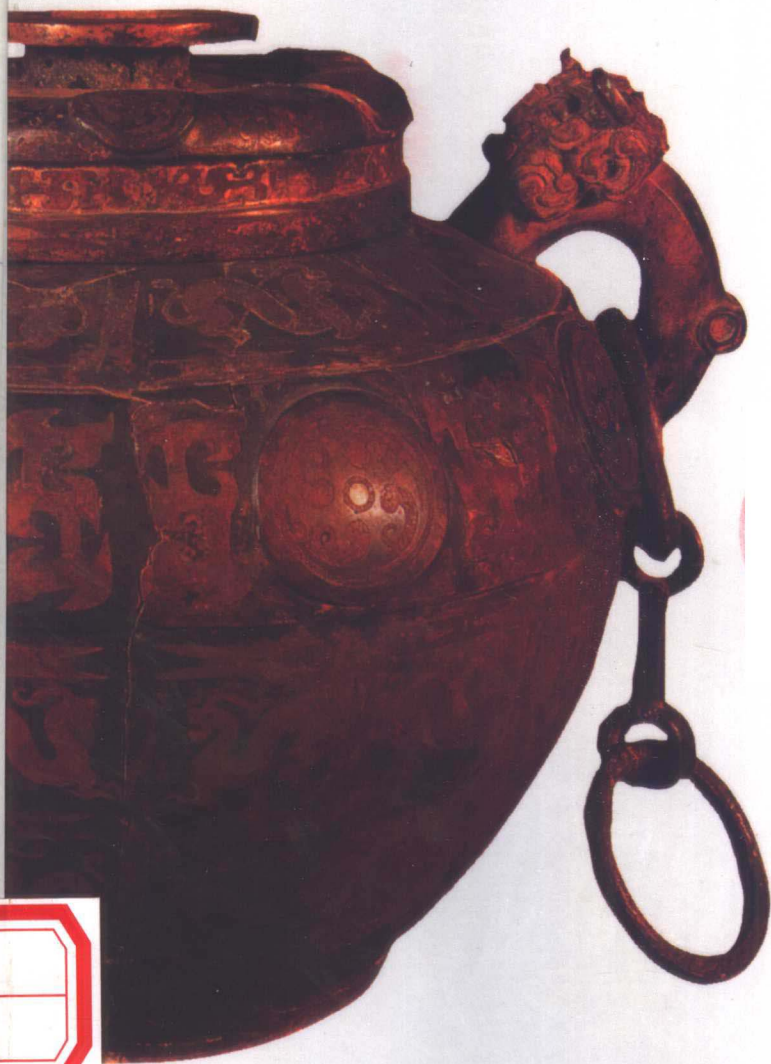
从唐代骆驼俑说起

文献整理与研究

关于《儒藏》工程及相关诸问题

学术动态

四库学研究的新开展



大象出版社

北平



北平

炎黄文化研究

◇主编 王俊义



第三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文化研究. 第3辑/王俊义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2

ISBN 7-5347-4041-X

I. 炎... II. 王...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4531 号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崔森波

封面设计 高 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79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 66202901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任	张文彬				
委	员	王 才	王志光	王俊义	方克立	冯广裕
		曲英杰	曲润海	李尚英	张文彬	张岂之
		耿相新	黄爱平	鲁 淳	漆永祥	
主	编	王俊义				
副	主 编	王 才	李尚英			
编辑部主任		李尚英				

目 录

专 论

- 中国传统文化三题 金冲及\1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研究

- 三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许顺湛\6
 黄帝与祭祀文化笔谈 \17
 张文彬:研讨黄帝祭祀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文明/张岂之:心祭重于形祭/鲁諝:
 黄帝祭祀与现代文明/王俊义: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戴治国 王芳辉:黄帝祭
 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曾雨农:对祭祖文化的遐想/郑德华:关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
 之现代传承/郝本性:祭祀、会盟与民族认同/陈平:黄帝祭祀的起源与发展/李桂民:
 崇拜黄帝的传统和现代祭祀黄帝问题/黄爱平:清代的黄帝祭祀与文化认同/李治
 亭:从满族的祭祀看民族的内向凝聚/柏明:当代公祭轩辕黄帝的思考/韩星:黄帝祭
 祀与中华人文精神/曲英杰:黄帝祭祀礼仪及相关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

- 华夏先民的始祖夫妇:伏羲和女娲 徐亦亭\38
 夏禹文化四议 李映发\50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 关于岭南文化的回顾与前瞻 张 磊 张 苹\65
 论澳门海洋文化 黄鸿钊\70

思潮与学派

- “天道”之为“圣道”
 ——体会《庄子·天道》篇 王树人\81
 道家文化作为崇尚悟性的创造智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 李明珠\92
 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立足于史籍编纂的考察 谢保成\102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及其礼学价值 王启发\118
 明季三毁书院及其影响 邓洪波\133
 清代学者王又朴易学发凡 汪学群\147

罗泽南理学思想论略	张晨怡\159
试探清中叶妇女学术生活	
——以阮元女眷为例	魏白蒂\168
黄遵宪的中西文化观与文化心态	左鹏军\181
五四时期章门弟子的中西文化观	卢毅\194

文化丛谈

许嘉璐教授谈中华文化复兴问题	\206
海峡两岸人士共话炎黄文化	王志光\209
关于文化的随想	宁可\215

探索与争鸣

重新解读孔子的仁	蒙培元\219
----------------	---------

文物与考古

秦刻石的文化信息	赵嘉朱 胡一雅\229
从唐代骆驼俑说起	梁丰\236

文献整理与研究

关于“《儒藏》工程”及相关诸问题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247
《四书大全》的性质、历史地位及相关问题	李畅然\258
清人张履程《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序》考述	张廷银\267

中华学人

永远的怀念	
——记王毓铨先生	何龄修\281

书评与序跋

《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读后	王俊义\290
《新编汪中集》简评	曾学文\295

学术动态

四库学研究的新开展	
——全国《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纪要	扬帆\298
同心协力,推进炎黄文化研究	
——《炎黄文化研究》新编委会成立会侧记	李尚英\306

中国传统文化三题

◇金冲及

一、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封建文化的同义语

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看作同义语。持有那种看法的学者有时引用一句名言作为立论的依据,那就是: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的思想便是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话并没有错,但如果由此引申出前面所说那种结论,便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事情至少要看到还有另外一面。中华民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育了几千年,能够绵延不绝,始终不散,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并且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很长时间站在世界前列,这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多见,一定有它的原因。

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漫长岁月的社会实践中,特别重视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从总体上认识人同环境的关系,逐渐形成一整套为多数人接受的道理和习尚。这不是哪个人或哪几个人所能凭空编织出来的,也不是少数人所能强加给所有人的,必须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的“磨合”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逐渐形成某些“游戏规则”,成为当时人们共同认可的是非尺度和行为准则。这是一种社会需要。它的最初产生,甚至在有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没有这种共同的“游戏规则”,社会生活就无法维持和运转。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用比较史学的眼光写道:“可以说,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摩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确实给我们留下许多好东西:比如,崇尚民族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自己,“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省吾身”,诚信,廉洁奉公,“慎独”;对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三人行必有吾师”;看待周围的事物,“天道有常”,“物极必反”,“否极泰

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民间谚语中也有许多好东西，如“人穷志不穷”，“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将心比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民族的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少方面并不能说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而是人们从长期实际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深深地影响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所以能几千年生存发展、没有中断而在今天又能重新复兴的重要原因。

当然，即使是祖先留下的东西里面也有消极的，特别是同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内容，如等级观念、男尊女卑、故步自封等。这些，直到现在仍有不小的影响，应当剔除或逐步改造。它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到近代更已大大落后于世界的进步。这就更要求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对传统既继承又批判，不断加以发展。

中国曾经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当然决不能忽视。前面说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留下的文化不能说全是当时的统治者根据他们的狭隘需要制造出来的，许多内容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但封建统治者必定要尽力把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游戏规则”纳入他们的需要，加以改造，作为巩固和强化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中国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那么长，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在这方面精心经营，把它理论化和系统化，这就给中国传统文化打上深深的封建主义烙印，两者紧紧地交织渗透在一起，难以分开。后者处于主导地位。所谓“三纲五常”便是突出的例子。程朱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要泯灭个人的合理利益和要求。这些都曾严重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妨碍中国的进步。其实，对封建文化同样必须作具体分析，它也包含许多值得吸取的有益养料，在它的上升时期尤其是如此，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总之，只要是人类社会留下的文化遗产，都是可以分析的，需要细心辨别它们中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不能像俗话所说：在倒去浴盆里的脏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

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

今天我们常常谈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这样说是不是自相矛盾而陷于混乱？自然不是。

经济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它是指：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各国和各个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再也分不开了。不管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对自身的经济发展，都必须有全球的眼光，充分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和诸多因素。与世隔绝、关起门来建设是做不到的。但经济全球化不等于经济一体化，事实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世界是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的。

经济和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在性质和特征上都有所不同。这来自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同。而文化问题又同民族问题无法分开。世界上有众多

民族。这些民族,长期居住在相同的地域或环境中,在经济和文化上密切联系,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回忆,逐步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以至文字语言,构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种状况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且继续受着它所处环境的影响,带有各自的明显特点,恐怕在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

当然,说难以改变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各种文化彼此总在相互影响着,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在中古时期曾受印度文化很大影响,近代以来更受到西方文化极大影响,给传统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这些外来影响如果要在中国生根,最后都中国化了,并没有消灭中国文化而把它变成另一种文化。鲁迅在上世纪初谈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时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前一句讲的是时代性,后一句讲的是民族性。

实际上,西方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它在发展进程中,同样也受到中国、古代中东、伊斯兰文明很多影响。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依然各自有它的文化特征,并不因此变成另一种文化,也没有因此产生一种全人类共同的普世文化。就拿西欧国家来看,它们的文化虽然相近,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不也依然有着各自的文化特征,并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异常珍惜和重视吗?

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有类似的地方,各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形成自己的性格特征。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价值观,一个是思维方式。如果将东方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作一点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强调群体意识,近代以来由于深重民族危机的威胁而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而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总体的把握和对立的统一,中医、国画等都可以作为例子。日本学者高桥进教授在《中国思想在世界史上的现代意义》一文中谈到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待观的世界观”,认为“‘此物’在同‘彼物’的对待关系中存在——这是东方的根本思维方法。其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周易》的理论中能看到”,“个人当被尊重,但更重要的是个人与个人要相互协同、联带、团结,以创造家庭、地域社会、民族、国家的有调和的共同体,来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东方精神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此”。这些是历史地形成的,而成为民族性格特征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同这些有关。它当然也有另外一面。有人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而忽视个体,强调综合而忽视分析,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中国近代的落后,在这些方面就吃了不少亏。但能不能把一切都反过来,只强调个体而忽视集体,只强调局部的分析而忽视总体的把握,那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未必可取,并且不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当然会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带来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原有的面貌,但不同民族的各自特点包括文化差异依然会存在。它们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取长补短。越是经济走向全球化,越需要重视全球各个成员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包括尊重文化多样性这个事实。这也是中国

专 论 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和而不同”的意思。决不可能在全世界只有一副面孔、一种文化,也不可能把某一种文化、某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持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和国家,要他们照搬照用,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中国人在文化上也要有自己的独立声音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一开始就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报告的结语只有四小段,而谈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就有五处之多。

用“复兴”这两个字和讲“发展”,两者既相通又有所不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要靠发展,没有发展便谈不上复兴,可是复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站在世界的前列,而在近代却落后了,在不短的时间内沦落到任人宰割和欺凌的半殖民地地位,被别人看作“劣等民族”,这使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都无法忍受,渴望恢复民族的主权和尊严,毫不逊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中国在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那么,今天面对的问题讲发展就够了,不需要讲什么复兴。

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不能把它误解为是要恢复一两千年前的所谓“汉唐盛世”。汉、唐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拿到今天来看,我们只能是发扬它那些优秀传统,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去全盘恢复它,如果还说要恢复到那时去,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决不意味着中国想称霸,那同我们“不称霸”的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它的含义,其实只是如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所说:“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这里讲的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复兴”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这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我们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可能,但需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继续作出极大的努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无论全球性的还是地区性的问题,人们都越来越注意要听取中国的声音。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种状况必须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步得到改变。

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地位,曾经在不少中国人中间造成一种很不好的畸形心理,就是民族自卑感,以为中国处处不如人,好像对外国的一切都要仰着头看,

只有处处跟他们学才算是适应现代潮流。这种心理是不健康的。

拿文化来说,前面提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在15世纪以前,中国曾创造出居于世界前列的古代文明,走在很多欧洲国家前面,这并不是偶然的。进入18世纪,这种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在这以后,西方国家远远走到了我们前面,今天,我们又在奋起直追,取得被全世界视为奇迹的成就。事物就是这样波浪式地发展着。现在,世界上都很重视中国的声音。在文化领域内,我们也应该有充满东方智慧和特色的中国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在这方面,决不能妄自尊大,排斥任何外来文化,甚至像以往有些人那样声言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那是荒唐的;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甚至把生搬硬套外国学者的某些未必适合于中国的论断视为时髦,结果,过分热衷于“趋时”却往往容易“过时”。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国情,努力创造出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文化来;和世界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许顺湛

中国文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文明的形成期,其时代跨度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一时期我把它称为邦国文明,与五帝时代相对应。第二阶段是中国文明的发展期,其时代跨度2000年左右,这一时期我把它称为王国文明,与夏商周三代相对应。第三阶段我把它称为帝国文明,与秦汉及其以后相对应。20世纪以后进入现代文明。关于中国文明源头必须在邦国文明阶段去找,我认为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即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五帝之首是黄帝,从逻辑上说黄帝时代应该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为此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进行论述^①,但是仍然感到言未尽其意,才产生了“三论”的念头。

一、黄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黄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首先要将黄帝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定位,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才有基础。同时,考古学文化也得有它的14C测年数据。两者都有了年代框架,才算具备了相对应的基本条件。我在《五帝时代研究》中有一篇《五帝年代框架的推测》^②,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年代进行了考证,对史书上各家之说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我的结论是:《春秋命历序》把尧列入帝喾十世之中,帝喾9年,在尧前,也归于帝喾十世内,因此尧和喾的在位积年只有与帝喾合并在一起计算。舜的年寿应该是几代人,但是在位年数还是作为一世计算为宜。古本《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舜在尧时摄政28年后执政50年,禹在尧舜时已经是联邦王朝中的重要成员,在舜执政后,禹曾摄政一个时期,之后代替舜而有天下。禹与舜不仅是同时代,而且是同朝执政(摄政),“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也可以说成黄帝至舜为世三十。我是按照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来确定五帝的,因此对伏羲太昊、神农炎帝暂不考虑,对少昊也

① 《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② 《五帝时代研究》第二章第二节,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不列入五帝之列。但是学者对五帝的“世”数各说不一,如黄帝有 18 世、10 世两说,颛顼有 19 世、9 世、20 世三说,帝喾有 20 世、10 世两说。帝桀在位 9 年未列入五帝之列。帝尧归入帝喾世,不计。舜禹合为一世。诸多不同的说法,我选定:黄帝 10 世、颛顼 9 世、帝喾 10 世(含尧)、舜(含禹)1 世,这样加起来正符合古本《竹书纪年》“黄帝至禹(舜)为世三十”的说法。关于五帝若干世的积年其说也不一致,黄帝有 2520 年、1520 年、400 年三说,颛顼有 350 年、500 年两说,帝喾(包括桀、尧)有 350 年、400 年、300 年三说,帝舜 50 年一说。各帝积年的选定的确有难处,孰是孰非很难找出证据来说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把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相对应,把颛顼、帝喾、尧、舜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对应,其中虽然假设性的成分很大,但是我对各帝积年的选定,是参考考古学考虑的。另外,还有一点是《汉书·律历志》的一条材料对我很有启发。如说:“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栢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这一段话的意思是,通过历法的计算,把黄帝在元凤三年的基点上,向上再推 6000 年是不可信的,往前推到 3629 年是可信的。有基点向上推算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材料。元凤三年为公元前 78 年,言黄帝以来 3629 年,即公元前 3707 年。但是这个数字只是黄帝制定历法的年代,黄帝的年代一定要早于它。这个数字与考古学结合,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根据上述基本情况,我对五帝年代的选定如下:黄帝 10 世 1520 年,颛顼 9 世 350 年,帝喾 10 世 400 年(包括桀和尧),帝舜 1 世 50 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始年(禹代舜后)定在公元前 2070 年,为了计算方便,我把夏始年定在公元前 2100 年,在此基点上,加上帝舜 50 年,即公元前 2150 年;再加上帝喾(包括尧)400 年,即公元前 2550 年;再加上颛顼 350 年,即公元前 2900 年;再加上黄帝 1520 年,即公元前 4420 年。这就是说黄帝始年当距今 6000 年以前。由此可以排出这样一个五帝年代框架:公元前 2100—前 2150 年为帝舜代,公元前 2150—前 2550 年为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 2550—前 2900 年为颛顼代,公元前 2900—前 4420 年为黄帝代。

五帝年代框架表

帝及世	积年	约为公元前年代
帝舜 1 世	50 年	约为公元前 2100—前 2150 年
帝喾 10 世(包括桀、尧)	400 年	约为公元前 2150—前 2550 年
颛顼 9 世	350 年	约为公元前 2550—前 2900 年
黄帝 10 世	1520 年	约为公元前 2900—前 4420 年

事实上五帝年代框架不会这样具体,它们之间还会有交叉,这里只是一个宏观的框架,大体上可以说五帝时代延续 2000 多年,上溯至公元前 4000 年前,终

于公元前 2100 年。本文着重是谈黄帝时代,有了颛顼、帝喾(尧)和舜的年代支撑,黄帝时代才不会是空中楼阁。黄帝十世是一个时代,有了大体年代框架,这就为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宏观对应提出了一个坐标,但是这个坐标学者们还都正在研究探索,并没有取得共识,所以我只有按照自己所认定的坐标来进行分析研究。

五帝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认定,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是依据公布的 14C 数据来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的 14C 测年只要在五帝年代框架以内,我都把它作为五帝时代文化看待,向上超过五帝时代我作为前五帝时代看待,晚于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略而不论。知道五帝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全貌,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就清楚了。我把两者对应的结果是:①公元前 4400 年前为前五帝时代,对应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早期文化(双庙沟、后岗早期、下王岗早期、半坡类型、北首岭下)、大地湾一期(包括老官台、李家村)文化、西河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白石文化、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早期文化、万年仙人洞遗存、甑皮岩洞穴遗存、福建贝丘遗址、贵州飞虎山遗址、徐水南庄头遗存、磁山文化、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早期文化等。五帝时代文化不是凭空产生,不是突然从外地迁来,而是在前五帝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公元前 4400 年至公元前 2100 年为五帝时代,其中公元前 4400 年至公元前 2900 年为黄帝时代,对应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洛阳王湾类型、后岗类型晚期、下王岗类型中期、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花套一期文化、薛家岗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晚期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早期文化、台湾前新石器文化、师赵村文化遗址、石岭下文化遗址、马家窑类型文化、红山晚期文化等。晚于黄帝时代文化的是颛顼、帝喾、尧、舜时代文化,其绝对年代大体是公元前 2900 年至公元前 2100 年,对应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中原龙山文化早中晚期,包括庙底沟二期、后岗二期、王油坊类型、郝家台类型(或煤山类型)、下王岗类型、王湾类型、三里桥类型、陶寺类型、陕西龙山文化(包括客省庄二期)、山东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中晚期文化、石峡文化、台湾圆山早期文化、云南菜园子遗址、贵州飞虎山遗址、成都平原古城遗址、广汉三星堆古蜀早期文化、昌都卡若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双砣子下层文化等。

本文主要是介绍黄帝时代考古学文化,但同时介绍了前五帝时代和颛顼、帝喾、尧、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其原因是为了让人们从宏观上能看到黄帝时代文化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位置。需要说明的是,有的考古学文化的测年数据上下跨度很大,我是依其多数数据确定其历史阶段的。如果测年数据不能断开,只有顺其自然,例如颛顼、帝喾、尧、舜,我只能笼统地与龙山文化对应。有不

① 《五帝时代研究》第五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

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测年与五帝时代不同阶段都能对应,但没有命名文化名称,在前边没有提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都是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测年数据偏晚,不属于五帝时代文化。五帝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文化宏观对应,不少文化都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从其主流弃其个例。

黄帝时代考古学文化有几十种,这是机械地与 14C 测年相对应的结果,但是地区文化有不平衡性,各类文化有不平衡性,也得具体分析。其实能够代表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仰韶中晚期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早期文化、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燕山地区的红山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类型文化。这几个地区在黄帝时代都形成了区域文明。

二、黄帝时代聚落群举例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年代在黄帝年代框架之内,遗址分布的范围与文献记载黄帝族团活动的地域也比较符合。庙底沟类型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最发达的一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以庙底沟类型文化的聚落群作为例证,来分析黄帝时代的社会大结构是有重要意义的。

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 14C 年代^①

地点	样品	实验室编号	14C 年代	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
陕县庙底沟	木炭	ZK - 0110	BP5230 ± 100	BC3990—3780
陕县庙底沟	木炭	ZK - 0112	BP4905 ± 170	BC3775—3360
西安南殿	木炭	WB81 - 19	BP5190 ± 80	BC3970—3110
西安南殿	炭化木	ZK - 0949	BP4720 ± 90	BC3449—3109
蓝田泄湖	螺壳	ZK - 0916	BP4995 ± 100	BC3777—3521
蓝田泄湖	木炭	ZK - 2140	BP4830 ± 90	BC3623—3359
蓝田泄湖	木炭	ZK - 2177	BP5270 ± 105	BC4035—3790
蓝田泄湖	木炭	ZK - 2180	BP4510 ± 110	BC3302—2910
秦安大地湾	木炭	ZK - 0742	BP5680 ± 90	BC4464—4335
秦安大地湾	木炭	WB80 - 54	BP5255 ± 90	BC3999—3788
秦安大地湾	木炭	WB80 - 53	BP5150 ± 90	BC3952—3699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续表

地点	样品	实验室编号	14C 年代	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
秦安大地湾	木炭	WB80-51	BP4995 ± 95	BC3776—3523
秦安大地湾	木炭	BK79029	BP5780 ± 80	BC4573—4362
民和阳洼坡	木炭	ZK-1211	BP4775 ± 80	BC3511—3343
蔚县三关	木炭	BK79079	BP5260 ± 80	BC3996—3790
蔚县三关	木炭	BK79098	BP5460 ± 200	BC4360—3828
蔚县琵琶嘴	木炭	BK81048	BP4790 ± 80	BC3597—3497
蔚县琵琶嘴	木炭	WB81-48	BP4655 ± 75	BC3359—3046
郑州大河村	木炭	ZK-0520	BP5120 ± 100	BC3950—3646
郑州大河村	木炭	BK76001	BP4550 ± 100	BC3330—2920
郑州大河村	木炭	BK76003	BP4800 ± 90	BC3612—3347

以上 21 个 14C 年代数据,涉及河南、陕西、河北、甘肃、青海等 5 个省域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年代。《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把庙底沟类型文化的时代定位在公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3500 年,但在陕西有 6 个 14C 年代数据,其上限大体符合,其下限已低于公元前 3500 年,达到公元前 3300 年前后。在甘肃大地湾庙底沟类型有 5 个 14C 测年数据,有 2 个数据已超出公元前 4000 年,有 3 个数据在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3500 年之间。河北省有 4 个 14C 测年数据,其上限超出公元前 4000 年,下限至公元前 3300 年前后。青海有 1 个数据,为公元前 3511—前 3343 年。河南大河村有 3 个数据,大体在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3300 年之间。河南三门峡有 2 个数据,一个是公元前 3990—前 3780 年,一个是公元前 3775—前 3360 年。三门峡的 2 个数据,它是当地庙底沟类型中期,因为有早于它的文化层,没有 14C 测年数据。从前边介绍的情况看,可以概括地说:庙底沟类型的年代,其上限已超出公元前 4000 年,其下限已接近公元前 3000 年。

河南省灵宝市有个黄帝铸鼎原,以它为中心分布着 105 处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灵宝 71 处,陕县 34 处,根据地理环境情况,可以组合 5 个聚落群,但是有的聚落群之间距离很近,甚至有的聚落群还有交叉,很难断开,陕县聚落群与灵宝的聚落群相邻很近,因此我认为这里分布的聚落群形成了一个群团。黄帝铸鼎原正在这个聚落群团之内,而且它具有祖庙、祭坛的性质,说确切一点可以称为“黄帝铸鼎原聚落群团”。使人兴奋的是,这个聚落群团的文化性质,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庙底沟类型文化。黄帝铸鼎原聚落群团中的聚落群,基本上都是金字塔形的组合模式^①。例如陕县聚落群有 34 处聚落遗址,其中特级聚落 1

^① 《追溯铸鼎原的历史辉煌》,载《炎黄颂》(中集),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 年。